

【企业管理】

# 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

党力, 杨瑞龙, 杨继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强烈反腐败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讨论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寻求政治关联和提高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两个互为替代的手段。反腐败由于增加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相对成本,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激励。在反腐败政策出台以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增加,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变化。对于国有企业,反腐败只能促进其高管有从政经历的企业的创新;对于非国有企业,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具有更普遍的正向影响。同时,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省级层面的异质性,反腐败越强的省份,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创新水平增幅越大。本文从政治关联的视角为“反腐有利论”提供了基于企业创新的证据。

**[关键词]** 反腐败; 政治关联; 企业创新; 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5)07-0146-15

## 一、问题提出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如何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变得尤为重要。早在2006年中国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创新成为驱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从微观企业层面看,虽然近些年企业研发支出不断增加,但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仍然不强,企业发展仍然较多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产出模式为主,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

实际上,创新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内生选择,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缺少足够的创新激励。杨其静<sup>[1]</sup>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企业既可以通过创新谋求发展,也可以通过寻求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获得发展。假设企业用于发展的资源是一定的,当获取政治关联的收益较高或成本较低时,企业就会主动谋求政治关联而减少创新投入。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腐败成本相对较低的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建立特殊的政治关联来获取利润,而不愿意通过企业创新获得发展,最终导致企业整体创新能力较低。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大批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因腐败问题而被查处。据统计,2003—2012年平均每年被查处的副厅级以上干部仅有30人,但2013年突然增加到

**[收稿日期]** 2015-06-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研究”。

**[作者简介]** 党力(1990—),男,陕西商洛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杨瑞龙(1957—),男,江苏昆山山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杨继东(1981—),男,吉林舒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党力,电子邮箱:dangli2008@163.com。

186人,2014年甚至达到380人之多。在高强度的反腐败之下,四川和山西等地的“塌方式”反腐败也被披露。可见,反腐败为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提供了契机。给定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两个选择,反腐败严重打击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在本轮反腐运动中,很多与腐败官员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家也纷纷落马,传统的政商关系受到冲击。在新的反腐局面下,一方面官员通过为企业提供保护获取私人收益变得困难,另一方面企业再难以通过官员提供的隐性保护来获得发展。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政治关联成本的上升必然带来企业创新成本的相对下降,为企业创新带来机会。

为检验上述理论,本文搜集了2010—2013年企业创新和政治关联数据,检验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的思想实验是,给定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权衡选择,如果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败导致企业追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大幅提高,企业创新激励将相应增加,那么,反腐败之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将会显著增加,说明积极反腐在微观层面有利于企业增加研发支出。

本文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增加了对企业创新的认识。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很多,但如果不能根除腐败环境,企业可通过政治关联获得发展,那么,企业创新能力就很难提高。另一方面增加了对反腐败的认识。在研究反腐败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中,一部分认为反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sup>[2-4]</sup>,另一部分则认为反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sup>[5-8]</sup>,但很少有文献研究反腐败对企业的影响。基于现有文献,本文试图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探讨本轮反腐败对企业的影响,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客观地评价此次反腐败的经济效益。

## 二、理论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相比,一个显著的差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通过获得政治关联来推动企业成长。Faccio<sup>[9]</sup>考察47个国家2001年上市公司样本发现,绝大多数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至少有1个大股东或企业高管是议员或政府部长,或者与高级政治家或政党具有紧密关系”的政治关联企业,平均占比为7.72%;还发现在那些政治监管严格的国家中政治关联企业通常较少,反之则较多。

在中国,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法治和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获取政治关联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手段。一方面,面对追求多样性的产品市场,企业需要依靠创新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作为著名的通信服务提供商,华为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基本维持在3000件左右,其中80%是发明专利。10多年来,华为在3G领域投入的研发费用已超过50亿元。另一方面,为获取必要资源,企业必须维护好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资源有限的企业必须在两种手段之间做出权衡<sup>[10]</sup>,更依赖哪种手段完全取决于两种方式的相对成本。如果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成本更小,会把资源用于获取政治关联,导致企业创新动机更低,进而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如果企业获取政治关联的成本相对较高,不能获得政治关联的支持,比如政治关联带来的廉价土地、优惠的银行贷款等,那么,企业就会通过创新寻求发展。

在本轮反腐败之前,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企业依靠政治关联来发展具有很强的优势。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经济资源,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对经济具有很强的控制力<sup>[10-12]</sup>。企业能否取得经济资源来发展,极大地取决于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sup>[13]</sup>。为了获得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企业会积极寻求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可能表现为企业家积极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同时,企业家更是希望与政府官员建立起某种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夺政府廉价资源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某种稳定

的竞争优势。这样,特定的企业与特定的政府官员之间往往就会建立起某种特殊而稳定的关联性,即所谓的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提高企业绩效。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突破各种管制和进入壁垒<sup>[14,15]</sup>,帮助企业获得银行的廉价贷款<sup>[16-21]</sup>,获得政府的直接补贴<sup>[22,23]</sup>。再加上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优势,激励非国有企业寻求政治关联以获取平等的竞争机会<sup>[1]</sup>。可见,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手段之一<sup>[11]</sup>。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民营制造业公司中,高管(董事长、CEO、董事长秘书、财务总监)和实际控制人中至少有1人具有官员背景的公司比例为11%,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公司比例高达42%。同时,中国是一个“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面临着以GDP为核心的锦标赛竞争的压力<sup>[24,25]</sup>,促使地方政府愿意与企业建立必要的政治关联<sup>[10]</sup>,减少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增强了政治关联的激励。相比而言,中国企业却面临着高额的创新成本。不完善的法制和低水平的产权保护制度使得创新企业的创新产品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创新收益低且风险大<sup>[26,27]</sup>。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说1:在政府控制大部分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资源有限的企业为了发展,在谋求政治关联和自主创新之间权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包括官员在企业兼职、企业雇佣官员的亲生子女或者企业高管自身就是官员或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对于官员来讲,政治关联为其带来较为丰厚的灰色收入;对于企业而言,政治关联给企业提供保护,避开了政府的进入壁垒,会带来巨大好处<sup>[26-30]</sup>。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政治关联毫无坏处,政治关联在帮助企业获得各种优惠和好处的同时也使企业时刻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政治关联使得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官员的政治命运。通常这种关联交易行为是被国家明文规定所禁止的,甚至有时候政治关联交易本身就是构成腐败的违法行为。反腐败力求打击官员的腐败行为,势必威胁到这种关系的存续。一旦有政治关联的官员因腐败问题而遭到法办,相关的企业与该政府官员之间的良好联系就会被反腐败切断。不仅官员难免遭受牢狱之灾,与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也将失去保护,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企业甚至倒闭。政治关联不仅增加了官员被查处的概率,提高了官员保护企业的成本,也加剧了企业发展的脆弱性,使得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在2013年10月—2014年7月期间,为了迎合国家反腐败政策,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229人次。这意味着不仅很多被清理的官员的仕途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也表明以前企业辛苦地维护的政治关联突然被中断,企业失去了保护的屏障,将对生产活动造成巨大的影响。

现实中经常看到,许多落马高官的亲生子女就是其政治关联公司的大股东,反腐败揭露了大批类似的官商勾结案件。高官的落马造成这些企业的生产波动急剧增大,很多企业直接停止营业,有的甚至倒闭。据统计,2012年11月—2014年因反腐败被查出的省部级干部达60多人,处级以上干部则成百上千,牵扯出的高管商人不计其数<sup>[28]</sup>,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只能静坐等死,毫无补救措施。中共十八大以后,政治关联成本剧增,很多原来依靠与政府打交道发展起来的企业纷纷做出调整,不再一味地依靠政治关联谋取发展,转而更加注重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品市场的研究。本文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反腐败之后,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明显增加,从2010年的700多万元增加到2013年的1400多万元。在政治关联和创新均为企业发展最主要手段的情况下,反腐败提高了政治关联的成本,势必增强企业创新激励。可见,反腐败一方面提高了政府官员为企业提供庇护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成本,降低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企业必然会加大创新投入,尤其是政治关联

比较强的企业,创新投入提高更大。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2:反腐败因提高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而降低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削弱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增强刺激企业创新的激励,有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尤其对于政治关联强的企业,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

### 三、研究设计

#### 1. 模型与估计方法

虽然理论分析认为中国企业政治关联对自主创新有替代作用,但依然缺乏实证检验。为了更好地分析反腐败是如何通过削弱政治关联来影响企业创新的,本文有必要先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佐证。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R\&D_{it} = \alpha + \beta \times PC_{it} + \gamma \times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D_{it}$ 表示企业的创新研发,采用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对数衡量<sup>①</sup>; $PC_{it}$ 表示政治关联; $Control_{it}$ 是控制变量,如资产负债率、利润率、国有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等;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模型(1)检验了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测量误差和内生性的问题。反腐败作为一项外生性的政策,可以被视为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的一次实验,评价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DIDs)。反腐败会提高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对于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反腐败对其创新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因此,本文将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作为控制组。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反腐败对其创新影响较大,因此,本文将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反腐败(处理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程度的增强而增大。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R\&D_{it} = \alpha + \beta \times PC_{it} + \kappa \times AntiCorr_{it} + \delta \times PC_{it} \times AntiCorr_{it} + \gamma \times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AntiCorr_{it}$ 代表反腐败程度; $PC_{it} \times AntiCorr_{it}$ 为交互项,衡量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如何随着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的不同而变化,度量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效应。

#### 2. 样本、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2010年以前,中国反腐败处于一个平稳期,反腐力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直到2012年,新一届政府才实行强力反腐,开始了一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运动。因此,本文选取2010—2013年中国沪市上市公司数据,构造了3590个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企业创新研发数据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剔除了金融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互联网和房地产等行业。

(1)政治关联的定义。本文延续以前文献对政治关联的定义<sup>[26,27,29,30]</sup>,将其理解为企业高管是否与政府工作人员保持良好关系,或者其本身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本文考虑的高管主要局限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因为:①董事长和总经理拥有公司主要的决策权和管理权,权力明显大于其他高管;②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般是一个公司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最高的,其政治关联程度应该也是最强的,对于他们依靠关系所不能解决的事情,其他高管也很难办到。

① 创新研发投入不完全等于企业创新。学术界通常采用R&D投入和专利数来度量创新,但专利数是企业长期创新的结果,无法反映反腐败带来的短期企业创新的增加,因此本文采用R&D投入衡量企业创新。在专利数不能作为良好指标的情况下,R&D投入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创新水平的变化。

政治关联主要分为高管是否党员 (*Party*)、政协委员 (*Npc*)、人大代表 (*Cppc*) 以及之前是否从政 (*Officer*)。其中, 党员主要指中共党员; 政协委员不仅指全国政协委员, 也包括地方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包含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代表; 是否从政主要是指该公司的高管以前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过, 或担任过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 或是地方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如果高管有以上特征, 则对应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1; 反之, 取值为 0。比如高管之前从过政, 则 *Officer*=1; 反之, *Officer*=0。本文通过加总政治关联的四个分量, 构建了总政治关联 (*PC*) 变量, 该指标不仅可以度量是否有政治关联, 也可以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弱。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可以看出在中国沪市上市的公司的政治关联很强。从政治关联的分项指标看, 高管是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从政经历的均值分别为 0.16、0.04、0.08 和 0.04; 从总政治关联的角度看, 该指标均值更高达 0.32, 企业政治关联的平均水平很高。

(2) 反腐败的度量。关于腐败的度量指标很多, 如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数据等。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反腐败的备选指标<sup>[31]</sup>, 但却都是调查数据, 难免过于主观, 而且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和测量误差的问题<sup>[31]</sup>。一部分学者采用经济案件的查处数量来度量反腐力度<sup>[28]</sup>, 但不够准确。本文只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立案数和查处数来度量反腐水平。

本文为反腐败提供了两个度量方法。第一个是间接度量方法, 即虚拟变量的方法。如果时间处于 2013 年以后 (含 2013 年), 则反腐败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1, 表示有反腐败或反腐败程度较强; 反之, 反腐败的虚拟变量取值为 0, 即没有反腐败或反腐败程度弱。本文之所以把 2013 年作为反腐败的节点, 主要是因为: ①新一届中国政府上任是在 2012 年末到 2013 年初, 高强度反腐实际上也开始于 2013 年; ②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一般是年初决策的, 2012 年创新决策不受反腐败的影响, 采用 2013 年作为节点, 能够更好地捕捉到反腐败对创新的影响。第二个是直接度量方法, 本文分别采用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Party</i>	党员	3590	0.16	0.53	0.00	0.00	5.00
<i>Officer</i>	从政	3590	0.04	0.21	0.00	0.00	2.00
<i>Cppc</i>	人大代表	3590	0.04	0.22	0.00	0.00	2.00
<i>Npc</i>	政协委员	3590	0.09	0.32	0.00	0.00	3.00
<i>PC</i>	总政治关联	3590	0.32	0.77	0.00	0.00	5.00
<i>AntiCorr1</i>	反腐败立案数	3590	151681.11	14271.83	137859.00	155000.00	173186.00
<i>AntiCorr2</i>	反腐败查处人数	3590	158131.32	15406.61	142893.00	160000.00	182038.00
<i>AntiCorr3</i>	反腐败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数	3590	5054.01	1834.17	2569.00	4843.00	7692.00
<i>AntiCorr4</i>	省级反腐败查处副厅级及以上干部人数	3590	1.69	2.99	0.00	0.00	19.00
<i>R&amp;D</i>	企业研发投入对数	3590	11.29	8.24	0.00	15.75	22.90
<i>Levit</i>	负债率	3589	0.57	0.65	0.03	0.14	18.94
<i>TobitQ</i>	托宾 Q	3561	2.31	7.30	0.28	1.53	389.22
<i>Sharecash</i>	每股自由现金流	2189	0.31	1.57	-16.63	0.28	11.97
<i>State</i>	国有企业	3590	0.07	0.26	0.00	0.00	1.00
<i>Age</i>	企业年龄	3590	2.74	0.34	0.00	2.77	3.40
<i>Scale</i>	企业规模	3590	21.61	2.06	0.00	21.57	28.69

注: 企业研发创新 (*R&D*) 数据来源于 Wind 金融数据库; 其他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腐败案件立案数 (*AntiCorr1*)、腐败案件查处人数 (*AntiCorr2*)、反腐败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数 (*AntiCorr3*)来度量反腐败的力度<sup>①</sup>。由表 1 可见,不管采用哪种指标度量,中国的反腐败水平都很高,高强度反腐势必对企业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3)其他控制变量。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很多,参考以往文献<sup>[26,27,29,30]</sup>,本文控制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长期发展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变量。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1. 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利用中国沪市上市公司数据来检验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关系,本文认为,在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和创新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在腐败的潜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企业有足够的动机通过低成本的方式发展,即谋求政治关联,而回避成本较高的发展方式,即自主创新。因此,本文采用全样本的回归检验了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见表 2 列(1)—(4)。但 2012 年之后,中国的反腐败水平明显加强,腐败和政治关联的成本显著增加,全样本回归所得的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关系可能是反腐败威慑效应的结果。因此,本文剔除了反腐败之后的样本,只保留反腐败之前的样本,进一步验证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在反腐败之前是否依然成立,结果如表 2 列(5)和列(6)所示。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研发支出的对数,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政治关联。列(1)、列(2)和列(5)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PC*)度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但总政治关联指标是政治关联四个分量的加总,直接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暗含的假设是四个分量指标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大小一样。这是一个太强的假设,强行回归可能会面临方程误设的问题。为了避免该问题,参考以往文献的处理方法<sup>[24-30]</sup>,本文拆分总政治关联的度量指标,再次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

表 2 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替代效应

变量	全样本				反腐败之前的样本	
	(1)	(2)	(3)	(4)	(5)	(6)
<i>PC</i>	-0.104 (0.134)	-0.385** (0.156)			-0.691** (0.268)	
<i>Party</i>			-0.573*** (0.216)	-0.838*** (0.244)		-1.364*** (0.440)
<i>Officer</i>			-0.404 (0.614)	0.164 (0.737)		0.305 (1.082)
<i>Cppc</i>			1.022** (0.448)	0.045 (0.507)		-0.673 (0.776)
<i>Npc</i>			0.381 (0.320)	-0.020 (0.415)		0.137 (0.77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590	2187	3590	2187	823	823
R <sup>2</sup>	0.414	0.526	0.416	0.528	0.552	0.555

注: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托宾 Q、每股现金流、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年龄;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0 计量整理。

①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回归中采用了该指标的对数形式。

替代效应,结果如表2列(3)、列(4)和列(6)所示<sup>①</sup>。

列(1)只考虑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后发现,虽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存在,但该效应并不显著。列(2)加入了其他影响企业创新的控制变量,发现政治关联的系数显著为负。企业的政治关联越强,其创新水平越低,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在中国,企业面临有限的资源约束,为了发展,必须在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做权衡,如果谋求政治关联的投入多,那么,企业创新投入自然就少,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为回避方程误设问题,列(3)和列(4)分别采用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来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列(3)只考虑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高管为党员或官员的企业的创新能力显著下降,高管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企业的创新能力反而增强;不同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同,但只有党员和人大代表两类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影响显著。列(4)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发现高管为党员或政协委员的企业的创新水平下降,高管为人大代表或官员的企业的创新水平上升,但只有高管为党员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负影响显著。综合列(3)和列(4)的结果,本文发现只有高管为党员这种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且稳定,其余三种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均不稳定;而且高管为党员对企业创新影响为负。这说明无论采用哪种指标,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都有明显的替代作用。为了进一步说明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替代效应的稳健性,列(5)和列(6)剔除了反腐败威慑效应,仅采用反腐败之前的样本回归,发现在反腐败之前,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依然存在,政治关联越强,企业创新水平越低,支持了假说1。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具有行政级别或是国家官员,与生俱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关联<sup>[1]</sup>。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是否适用于国有企业,本文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检验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为了消除反腐败的威慑效应,进一步细分出全样本和反腐败之前的样本。结果如表3所示。列(1)—(4)考虑非国有企业,列(5)—(8)考虑国有企业;列(1)、列(2)、列(5)和列(6)采用全样本回归,列(3)、列(4)、列(7)和列(8)仅用反腐败之前样本回归;列(1)、列(3)、列(5)和列(7)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列(2)、列(4)、列(6)和列(8)采用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

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列(1)和列(2)显示,不论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还是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都呈负相关关系,政治关联强的企业的创新水平较低。这支持了本文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替代效应的假说。列(3)和列(4)显示,剔除了反腐败的威慑效应后,尽管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不显著,但采用拆分政治关联指标时,政治关联依然对企业创新有明显替代作用。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列(5)—(8)显示,尽管存在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但该效应都不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显著替代关系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虽然与生俱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关联,但并不意味着其不需要更多的政治关联。相反,正是本身具有的政治关联减少了国有企业寻求更强政治关联的成本,削弱了其将有限资源在寻求政治关联和创新之间分配的权衡,因此,才导致回归中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存在但不显著。本文推断,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依然存在,反腐败依然会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

## 2. 反腐败、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

虽然在中国,政治关联能够替代企业创新,在帮助企业发展的同时,规避了企业通过创新谋发展所面临的高风险和低成本,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sup>[1,26-30]</sup>,并不意味着政治关联的优势会一直

<sup>①</sup> 后续回归对政治关联的处理,同样分别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和分开的政治关联指标两种方式。

表 3 政治关联对创新关系的替代效应如何随企业性质变化

变量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全样本		反腐败之前样本		全样本		反腐败之前样本	
	(1)	(2)	(3)	(4)	(5)	(6)	(7)	(8)
<i>PC</i>	-0.359** (0.163)		-0.188 (0.199)		-0.465 (0.580)		-0.800 (0.814)	
<i>Party</i>		-0.871*** (0.260)		-0.546* (0.318)		-0.412 (0.725)		-0.407 (0.831)
<i>Officer</i>		0.803 (0.763)		0.266 (0.989)		-3.815 (2.545)		2.827 (5.313)
<i>Cppc</i>		-0.264 (0.548)		0.177 (0.687)		0.999 (1.330)		0.133 (2.405)
<i>Npc</i>		-0.0112 (0.421)		0.0493 (0.490)		1.483 (2.326)		-3.664 (3.18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023	2023	2023	2023	164	164	164	164
R <sup>2</sup>	0.528	0.530	0.523	0.524	0.578	0.583	0.559	0.566

注:括号内均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0 计量整理。

持续。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建立联系的官员,一旦这些官员失势,企业必须另寻发展之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使大批腐败官员被法办,切断了企业与官员进行政治关联的通道,提高了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因此,本文推测此次反腐败必将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水平;而且越是政治关联强的企业,该效应越大。为了检验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

这里利用反腐败虚拟变量度量反腐败水平,即如果时间处于 2013 年以后(包括 2013 年),则存在反腐败或反腐败强度较大, *AntiCorr*=1;反之,则不存在反腐败或反腐败强度小, *AntiCorr*=0。而采用双重差分法以时间虚拟变量度量反腐败,无法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因此,为了修正因无法控制年份固定效应而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借鉴范子英<sup>[2]</sup>的做法,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即在回归模型中不控制反腐败的虚拟变量,但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水平,用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对数表示;主要解释变量为反腐败以及反腐败和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后者反映了反腐败如何削弱政治关联对创新的替代作用。同样,为了回避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可能造成的方程误设问题,本文也采用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回归。

表 4 中列(1)—(4)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列(5)和列(6)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列(1)、列(2)和列(5)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列(3)、列(4)和列(6)采用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列(1)只考虑了反腐败、政治关联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后,反腐败和交互项对企业创新都有正的影响。反腐败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水平越高;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或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更大;但交互项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系数不显著。列(2)加入了更多控制变量,发现反腐败和交互项对企业创新都有正的影响,且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反腐败对政治关联较强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更大。这表明反腐败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削弱了政治关联对于企



业创新的替代作用,有利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列(3)和列(4)采用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支持了列(1)和列(2)的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假说2。

但前4列的回归都无法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列(5)和列(6)分别用总政治关联和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方法进一步检验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反腐败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影响,反腐败对政治关联强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更大的影响。这说明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增强而增大,反腐败能够削弱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表 4** 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变量	双重差分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1)	(2)	(3)	(4)	(5)	(6)
<i>AntiCorr</i>	0.677** (0.267)	0.386 (0.279)	0.694*** (0.267)	0.395 (0.280)		
<i>PC</i>	-0.226 (0.159)	-0.727*** (0.209)			-0.732*** (0.209)	
<i>AntiCorr×PC</i>	0.472 (0.292)	0.801*** (0.307)			0.807*** (0.307)	
<i>Party</i>			-0.665** (0.260)	-1.293*** (0.338)		-1.292*** (0.337)
<i>Officer</i>			-0.865 (0.688)	-0.317 (0.892)		-0.280 (0.888)
<i>Cppe</i>			0.836 (0.527)	-0.517 (0.602)		-0.554 (0.601)
<i>Npc</i>			0.445 (0.371)	0.139 (0.571)		0.115 (0.569)
<i>AntiCorr×Party</i>			0.355 (0.461)	1.061** (0.483)		1.060** (0.483)
<i>AntiCorr×Officer</i>			1.649 (1.390)	0.982 (1.490)		0.946 (1.489)
<i>AntiCorr×Cppe</i>			0.649 (0.984)	1.375 (1.030)		1.420 (1.030)
<i>AntiCorr×Npc</i>			-0.171 (0.726)	-0.306 (0.810)		-0.285 (0.8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行业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590	3590	3590	3590	3590	3590
R <sup>2</sup>	0.412	0.526	0.415	0.529	0.527	0.530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0 计量软件分析得到。

前面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其创新的替代效应不显著,因此,这里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检验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不同影响,结果见表 5。列(1)—(4)仅对非国有企业样本回归,列(5)—(8)仅对国有企业样本回归;列(2)、列(4)、列(6)和列(8)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列(1)—(4)发现,不论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还是拆分的政治关联指标,以及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还是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反腐败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非国有企业创新都有正的影响。这说明对于面临资源约束的非国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反腐败能够削弱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而且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增强而增大,政治关联越强,企业创新的提高幅度越大。列(5)—(8)研究了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反腐败与政治关联交互项对国有企业创新也具有显著正的影响,反腐败有利于削弱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创新的替代作用,增强国有企业的创新且该创新效应也随着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的增强而增大。并且反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不同的趋势: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影响面更广,尤其对于高管为党员或人大代表的企业,反腐败的效应更大;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仅对那些高管有过从政经历的企业创新水平有更大影响。

表 5 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不同影响

变量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1)	(2)	(3)	(4)	(5)	(6)	(7)	(8)
<i>AntiCorr</i>	0.443 (0.288)		0.440 (0.288)		-0.582 (1.362)		-0.380 (1.404)	
<i>PC</i>	-0.642*** (0.217)	-0.648*** (0.217)			-1.344* (0.808)	-1.374* (0.804)		
<i>AntiCorr×PC</i>	0.663** (0.322)	0.669** (0.322)			2.020* (1.069)	2.036* (1.070)		
<i>Party</i>			-1.285*** (0.348)	-1.285*** (0.348)			-1.653 (1.645)	-1.659 (1.660)
<i>Officer</i>			1.149 (0.896)	1.175 (0.892)			-8.700*** (3.162)	-8.622*** (3.219)
<i>Cpcc</i>			-1.182* (0.637)	-1.213* (0.634)			4.234* (2.300)	3.872* (2.251)
<i>Npc</i>			0.183 (0.564)	0.162 (0.558)			3.641 (3.386)	3.704 (3.403)
<i>AntiCorr×Party</i>			1.008* (0.522)	1.008* (0.522)			2.147 (1.738)	2.120 (1.746)
<i>AntiCorr×Officer</i>			-0.851 (1.541)	-0.879 (1.540)			18.28*** (4.295)	18.13*** (4.414)
<i>AntiCorr×Cpcc</i>			2.123* (1.096)	2.164** (1.095)			-3.383 (2.429)	-3.034 (2.401)
<i>AntiCorr×Npc</i>			-0.364 (0.836)	-0.345 (0.833)			-6.062 (3.925)	-6.055 (3.95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023	2023	2023	2023	164	164	164	164
R <sup>2</sup>	0.528	0.529	0.531	0.532	0.582	0.586	0.610	0.613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0 计量整理。

前文指出,政治关联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不显著,但为什么反腐败也会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呢?在中国,尽管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与生俱来,但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不需要依靠政治关联来发展,国有企业反而会利用已有的政治关联以更低的成本谋求更强的政治关联,这不仅是前面回归中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效应存在但不显著的原因,也是现实中的政商勾结大部分出现在国有企业高管与官员之间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秉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仅提高了非国有企业寻求一般政治关联的风险和成本,也提高了国有企业寻求更强的政治关联的风险和成本。因此,本文推测只要反腐力度够强,反腐败依然会对那些寻求更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的创新有更大提高。列(3)、列(4)、列(7)和列(8)的结果支持了该观点,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于高管为党员或人大代表的企业提高创新的效益更大;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只对那些高管有过从政经历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更大<sup>①</sup>。

## 五、稳健性检验

### 1. 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以时间虚拟变量度量反腐败,为了更好地验证本文观点,这里参考已有文献<sup>[28]</sup>,构建三个反腐力度的指标,即腐败案件立案数(*AntiCorr1*)、腐败案件查处人数(*AntiCorr2*),反腐败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数(*AntiCorr3*)来分析反腐败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6是对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列(1)—(6)分别采用了腐败案件立案数、腐败案件查处人数、反腐败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人数三个不同指标。为了修正方程误设问题,列(1)—(6)分别采用了总政治关联和拆分的政治关联两个指标。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发现,反腐败和交互项对企业创新都有显著的正影响;反腐败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也有利于削弱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对有越强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创新水平的提高越大。列(3)—(6)采用不同的反腐败度量指标发现了同样的结果,支持了前面的结论。

### 2. 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省级异质性检验

这里采用省级反腐败数据。根据前面的结论可以推测,反腐败越强的省份,企业越没有激励通过政治关联谋求发展,因而反腐败之后,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越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列(7)和列(8)。

列(7)和列(8)采用反腐败查处省级副厅级及以上干部人数的对数作为反腐败度量指标,发现反腐败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随着省级反腐败程度的增强而增加。反腐败不仅在国家层面提高了腐败和政治关联的成本,净化了市场环境,促进了企业创新,在省级层面,反腐败越强的省份,反腐败之后企业的创新水平的提高也越大。可见,反腐败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重大影响。

### 3. 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企业层面异质性检验

尽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有所不同,但反腐败都提高了两者的创新水平。这里利用前面构建的三个反腐败备选指标,再次检验反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创新有何不同影响。表7是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表8是国有企业回归结果。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方程误设问题,表7和表8分别采用不同的政治关联指标。

表7回归结果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和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反腐败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而且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反腐败对其创新的提高效应更大;尤其对于那些高管是党

<sup>①</sup> 在本文的四种政治关联中,从政经历是最强的一种,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会打击其寻求更强政治关联的激励,因此该交互项系数显著;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具有普遍影响。

表 6 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变量	AntiCorr1		AntiCorr2		AntiCorr3		AntiCorr4	
	(1)	(2)	(3)	(4)	(5)	(6)	(7)	(8)
<i>AntiCorr</i>	4.068** (1.735)	4.055** (1.735)	4.049** (1.719)	4.037** (1.719)	2.558*** (0.886)	2.549*** (0.887)	-0.0982 (0.291)	-0.102 (0.303)
<i>AntiCorr×PC</i>	3.895** (1.560)		3.821** (1.490)		0.727* (0.375)		0.475*** (0.168)	
<i>AntiCorr×Party</i>		5.267** (2.476)		5.166** (2.359)		0.923 (0.597)		0.465* (0.278)
<i>AntiCorr×Officer</i>		2.129 (7.492)		2.241 (7.250)		1.692 (1.761)		0.627 (0.856)
<i>AntiCorr×Cpcc</i>		7.196 (5.223)		6.914 (5.020)		1.187 (1.138)		0.408 (0.594)
<i>AntiCorr×Npc</i>		-0.277 (4.292)		-0.297 (4.093)		-0.597 (0.917)		0.205 (0.5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187	2187	2187	2187	2187	2187	2187	2187
R <sup>2</sup>	0.527	0.529	0.527	0.529	0.527	0.529	0.557	0.515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此处省略了政治关联变量,只保留反腐败和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下表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0 计量软件计算得到。

表 7 反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变量	AntiCorr1		AntiCorr2		AntiCorr3	
	(1)	(2)	(3)	(4)	(5)	(6)
<i>AntiCorr</i>	3.887** (1.809)	3.796** (1.809)	3.880** (1.792)	3.795** (1.792)	2.453*** (0.923)	2.430*** (0.923)
<i>AntiCorr×PC</i>	3.431** (1.652)		3.330** (1.578)		0.537 (0.385)	
<i>AntiCorr×Party</i>		5.038* (2.664)		4.948* (2.542)		0.847 (0.627)
<i>AntiCorr×Officer</i>		-7.811 (7.736)		-7.332 (7.456)		0.342 (1.777)
<i>AntiCorr×Cpcc</i>		11.010* (5.641)		10.690** (5.416)		1.856 (1.194)
<i>AntiCorr×Npc</i>		0.850 (4.424)		0.522 (4.230)		-1.148 (0.88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023	2023	2023	2023	2023	2023
R <sup>2</sup>	0.529	0.532	0.529	0.532	0.528	0.531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0 计量整理。

表 8 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创新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变量	国有企业					
	AntiCorr1		AntiCorr2		AntiCorr3	
	(7)	(8)	(9)	(10)	(11)	(12)
<i>AntiCorr</i>	2.209 (7.680)	2.942 (7.659)	2.032 (7.620)	2.577 (7.596)	0.842 (3.897)	0.943 (3.930)
<i>AntiCorr</i> × <i>PC</i>	6.399 (4.838)		6.771 (4.729)		3.681** (1.529)	
<i>AntiCorr</i> × <i>Party</i>		6.881 (8.114)		7.241 (7.861)		4.420** (1.832)
<i>AntiCorr</i> × <i>Officer</i>		99.650*** (23.720)		97.210*** (22.200)		10.850 (8.763)
<i>AntiCorr</i> × <i>Cpcc</i>		-36.280*** (10.760)		-33.220*** (9.913)		0.478 (5.923)
<i>AntiCorr</i> × <i>Npc</i>		-55.590*** (18.020)		-50.500*** (17.820)		1.237 (7.47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和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R <sup>2</sup>	0.581	0.619	0.582	0.619	0.591	0.602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Stata14.0 计量整理。

员或人大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反腐败的异质性效应更加明显。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交互项不显著,仅有反腐败与官员、反腐败与人大代表以及反腐败与政协委员这三个交互项显著;但只有反腐败与官员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反腐败与人大代表、反腐败与政协委员的系数为负。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前面的观点,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会显著增强国有企业寻求更强政治关联的成本,激励该类型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对于其他类型国有企业,反腐败对创新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有可能是负的。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其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普遍影响。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从企业发展的微观角度,利用中国沪市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反腐败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明显替代作用;反腐败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削弱了政治关联对创新的替代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只会对特定类型企业的创新提高有正的影响,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没有得到全面发挥。

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然依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然而政治关联弱化了企业的创新激励。为了鼓励企业创新,政府应弱化企业的政治关联激励。应该不断下放经济资源管理权限,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控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限,弱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从源头上削弱企业追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消灭官员依靠权力向企业寻租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释放反腐败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作为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鲜明的政策之一,反腐败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探讨反腐败对经济影响的文章<sup>[6,7]</sup>。反腐败到底对经济增长有利还是有弊?如何客观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次反腐败的经济影响?这些都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企业创新角度为“反腐有利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只有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且客观地评价此次反腐败对经济的影响,才能为中国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变做出理论上的支持。

反腐败虽然能够削弱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激励,促进企业创新,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不平等竞争的实质没有改变,滋生企业过多追求政治关联的土壤依然存在。只有从根本上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袒行为,缩小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地位上的差距,使两者公平竞争,才能进一步释放反腐败对于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这对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帮助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都有很大启示。

#### [参考文献]

- [1]杨其静. 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J]. 经济研究, 2011,(10):54-66.
- [2]He, Zeng-ke. 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 in Reform China[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0,33(2):243-270.
- [3]傅勇. 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 经济研究, 2010,(8):4-15.
- [4]高远. 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经验[J]. 南方经济, 2010,(2):15-27.
- [5]Zheng, Bing-yong.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4.
- [6]龙小宁,黄小勇. 反腐败与投资增长[D].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 2014.
- [7]Lan, X., and W. Li. Swiss Watch Cycles: Evidence of Corruption During Leadership Transition in China[R]. Fuda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3.
- [8]Qian, N., and J. Wen. The Impact of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n Luxury Imports in China[R]. Yale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5.
- [9]Faccio, Maral.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96(1):1-26.
- [10]Qian, Y., and G. Roland. Federalism &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88(5):1143-1162.
- [11]Li, Shao-min, Shu-he Li, and Wei-ying Zhang.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28(2):269-292.
- [12]Xu, C.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49(4)1076-1151.
- [13]Boubakri, N., J. Cosset, and W. Saffar.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8,14(5):654-673.
- [14]Oates, W. E., and R. M. Schwab. 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Efficiency Enhancing or Distortion Inducing[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8,35(3):333-54.
- [15]杨其静,杨继东. 政治关联、市场力量与工资差异[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2): 69-77.
- [16]张敏,张胜,王慧慧,王成方. 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0,(11):143-153.
- [17]于蔚,汪淼军,金祥荣.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J]. 经济研究, 2012,(9):125-139.
- [18]马晓维,苏忠秦,曾琰,谢珍珠. 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与企业行为的研究综述[J]. 管理评论, 2010,(2): 3-10.
- [19]邓建平,曾勇. 金融关联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J]. 金融研究, 2011,(8):78-92.
- [20]罗党论,魏焘.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方经济, 2012,

- (11):29-39.
- [21]汤玉刚,苑程浩. 不完全税权,政府竞争与税收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0,(10):1-10.
- [22]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J]. 经济研究, 2009,(7):21-33.
- [23]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3,(5):116-130.
- [24]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6):33-40.
- [25]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7):36-50.
- [26]余明桂,潘红波.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管理世界, 2008,(8):9-21.
- [27]罗党论,唐清泉. 政治关联、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 2009,(7):84-96.
- [28]聂辉华,王梦琦. 政治周期对反腐败的影响——基于2003—2013年中国厅级以上官员腐败案例的证据[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4):5-15.
- [29]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J]. 经济研究, 2008,(7):53-66.
- [30]胡旭阳,史晋川. 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8,(4):5-14.
- [31]聂辉华. 腐败对效率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J]. 金融评论, 2014,(1):13-23.
- [32]范子英. 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的转移支付分配[J]. 经济研究, 2014,(6):129-141.

## Anti-Corruption and Firms' Innovations: An Explanation from Political Connections

DANG Li, YANG Rui-long, YANG Ji-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adopted a sever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ince the 18<sup>th</sup> Party Congress in China,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nti-corruption on firms' R&D invest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e results find that in China, seeking for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are two substitutive ways for firms to develop themselves. After th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firms with strong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R&D investments, and anti-corruption has a good effect on firms' innovation. The furthe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irms, anti-corruption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firms' innovation investments. For SOEs, anti-corruption can only enhance the R&D investments of firms when their managers are former officers in governments, while for Non-SOEs, anti-corruption have more bridge positive effects on firms' R&D investments. Additionally, for firms in provinces with strong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he increases of R&D investments of firms with strong political connections are much more than that of firms without political connections. This paper lays a micro-foundation for the suggestion that anti-corruption is good for firms' innovation, providing a new idea about the effects of this anti-corrup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anti-corrup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rms' innovation;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s)

**JEL Classification:** D02 H32 P16

[责任编辑:覃毅]